

**往事如昨**

我与谱书的故事

赵良山



作者与嵇德升于宋继澄墓碑前合影

我的祖籍是海阳凤城，1965年我出生于一个距海8里的小山村，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，为“嵩阳赵氏”二十世孙。

一世祖赵仁六爷，据知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三世孙，江南镇江府丹阳县九都人。因于明代征战有功，其长支子孙世袭大嵩卫百户职务。清雍正十三年撤卫后，遂家焉。大嵩卫，即今之海阳。

我所知先祖之事，皆来自我族之《嵩阳赵氏世谱》。

嵩阳，嵩山之阳，旧大嵩卫驻地，也即老海阳县城治所。此嵩山位于海阳凤城北15里，因峰峦奇秀若嵩岳之状，故名。

我与族谱结缘，是值刚识字的龆龀之年——8岁而已。

我是吃着地瓜长大的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地瓜是农村主食，储地瓜处有二：炕下之地瓜井、里屋之天棚上。天棚是用胡秸秆铺的，不负重，更不适大人在上走动。每爬棚取地瓜时，体重较轻的我就被推为首选。

一次在昏暗的油灯光下，我发现天棚墙角下有个牛皮纸包裹，打开一看竟是谱书。那时还不知谱书是啥东西，只能辨认几个字而已。

问及父亲，却被狠狠地叱了一顿，并警告我以后不准碰那包东西。可暗地里，我与二哥还是常常偷偷地翻看，且照着谱书上的蝇头小楷用手指比画着。

改革开放后，或许是因族谱在我家之故，我父亲是首位请“祝子”回家祭祀的人（“祝子”之“祝”，有叫“祖”或“影”的）。后来村中赵姓族人纷纷效仿，可问题是很多人不知其高、曾、祖叫何名字，于是《嵩阳赵氏世谱》就被我父亲献了出来。

再之后，因填“祝子”，族谱几

经流动，最后流于洪泽爷手里。回头想想，族谱幸好流至他手，因他老人家爱书又会书法，更知族谱之珍贵。

《嵩阳赵氏世谱》一函六册，历经康熙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光緒、民国六修，皆为手写本，品相较好，是难得的家族之宝。

据我父亲说，此谱是我村赵合爷慧眼识珠，早年去凤城赶集卖海米，用欲包海米的报纸与一大娘交换而来的。二人皆大欢喜：合爷抱得了“美人”归；大娘有了年关糊墙的纸。

带回村的谱书，起初放在赵氏祠堂里。“破四旧”时，洪财爷从旧纸堆里把它抢救了出来，怀揣于破棉袄里，在一个隆冬的夜晚送到我父亲手上。父亲是个胆大之人，持谱书守口如瓶，最终躲过了浩劫。

2012年，我族要续谱，洪泽爷自担重任，我毛遂自荐为助手。电话联络外地族人、驱车走访各村镇，皆自费。凭着这部老谱，又查阅相关资料，越五载，《嵩阳赵氏世谱新安支谱》成稿，全赖洪泽爷一人手写而成，并又抄多部分发给族人，我们二人虽苦尤甘！

家谱，是家史，从中能得知各族之联姻情况。如孙中山与尤列两家联姻，是凭《常熟尤氏世谱》而知；周恩来与鲁迅间之宗亲关系，是靠《绍兴周氏世谱》而查明；清代大学者牟庭和新儒学大家牟宗三之辈分，是依《栖霞名宦公牟氏世谱》而理顺。

家谱，是国史、通志、县志外文史之补充。如：大明鼎革，莱阳邑难死亡人数之多；捻军东犯，胶东抗匪伤亡之重等，皆在族谱中有记载。

家谱是血脉，是桥梁，是纽带。修谱，可把族人维系在一起，使炎黄子孙代代相拥。

之后，我力所能及地搜集不同姓氏之谱书，尤其钟爱胶东老谱书。或书商推送，或买于冷摊，或随烟台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文研社探村而求得复印件。我先后拥有了莱阳赵氏、莱阳姜氏、莱阳吕氏、莱阳宋氏、莱阳李氏、莱阳双山张氏、即墨黄氏、即墨蓝氏、栖霞隋氏、栖霞林氏、栖霞名宦牟氏、海阳司马李氏、福山衙前王氏、福山官庄陈氏、福山张村张氏、文登吕氏、黄县吕氏、只楚小沙埠王氏、黄务东珠岩孙氏等族谱，其中不乏名谱。

为弄明莱阳“两宋”之来源、为了解山左大儒宋继澄后裔之情

况、为寻访莱阳天水郡赵氏，我与初征军曾多次赴莱阳。在万柳村，我还意外寻访到了《谯郡嵇氏族谱》，征得嵇德升老人同意拍照后，回家进一步研究得出结论：天下嵇氏，皆“竹林七贤”之一嵇康之后人。

“一村一探”是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文研社研学的内容之一，在曲德顺社长带领探村中，我受益颇多。每探村，必与村民聊谱书，且多有收获。

宫家岛村张学东主任及张涛老先生对其族人张桐人颇有了了解。民国时，烟台街商铺之牌匾多是桐人先生所书。从张涛老先生提供的谱书中得知，其村张姓来自仉村张，是元时随张起岩来福山任教谕之仆人张成的后裔，二人皆济南人。这个发现，也打破了该村是“山西大槐树”移民之说。

探村结识的东珠岩孙德恺君，据知是三国时期孙权的后裔，年轻有为，懂谱爱谱存谱。其远祖8人唐时为避战乱，自辽东浮海而来，于福山八角登陆遂家焉，后开枝散叶，其子孙遍及胶东各地乃至全国。

我收藏之《天水郡赵氏世谱》是莱阳本家赵金光君提供的。有幸结识他，是探村结识的福山紫埠赵仁兄的引见。

在我收藏的所有族谱中，尤爱《莱阳敦睦堂姜氏族谱》，视为无价之宝。不仅因姜塤、姜塤兄弟二人皆为明代进士，更因其誓不做二臣之民族气节，深深地感动着我。莱阳遭癸未邑难时，“二姜”先生家死亡人数有15人之多。除了父亲姜泻里与四弟姜坡是战死外，余之妻女婢女皆殉节而死。姜坡夫人左氏为左懋泰之女，更是受辱不屈，骂敌撞墙而死。姜塤、姜塤二人晚年隐居苏州，州人于虎丘立“二姜”祠祭祀之。烟台市书协秘书长姜玉松先生是“二姜”之兄姜沂之后，每拜观谱中先祖画像及像赞，总是感慨万千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……

那套新续的《莱阳左氏族谱》，是因其中有“南明文天祥”之称的左懋第而购买的，读后，深深为其民族大义所折服！

水有源，木有本，家谱能“叙彝伦，别昭穆，敦礼让，教孝悌，为尊祖敬宗之大原”。古人曰：爱亲者，不敢恶于人；敬亲者，不敢慢于人。读谱自能体会此番道理，在有生之年，我愿继续积谱、藏谱、读谱。

乡村记忆

俺村打更的那些事

孙景璞

更(gēng)，字典说是旧时夜间计时的单位，一夜分为五更，每更约两个小时，大约从晚6点至8点为一更，8点至10点为二更，10点至12点为三更，12点至次晨2点为四更，晨2点至4点为五更。在戏剧舞台上，也会经常看到打更的场面：两个茶衣丑，一人持木梆，一人手拿铜锣，每更敲一下梆、敲一下锣。常打的有“三更天”，说明夜深人静了，“四更天”，说明快要天亮了。打更的人叫更夫，是地方政府安排的有偿服务人员，或者是大户人家私人雇佣的看家护院的佣工。你可别小看这一个字的记时单位，它可是旧时人们脑海里的重要时间概念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，人们常挂在口头上，写在文章里。如：三更半夜、更深人静、更令明号、夜阑更尽等等。

我的家乡莱州城北连郭庄村，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曾有打更的。那时我在童年时代，有些事情并不完全知道，我们胡同里的昌叔曾做过更夫，他在我们家常常说起打更的事，所以我才能写出这篇不详尽的稿子。

昌叔说，那时候他们更夫共有20多人，多是中年人，归村公所领导，工钱很少，但是可以顶劳役(即义务工)。两个人一班，10天一轮换。上班时，一人拿着木梆，一人拿着铜锣，间断性地只敲梆子，一更敲一下，二更敲两下……一般情况下，只敲木梆，不敲铜锣，遇有情况才敲锣报警。一更时间不用巡逻，二更开始巡逻，“梆梆”“梆梆”地边走边敲。我们村有三条东西大街，只巡逻中心大街，从东头开始，走到村西头，然后到更铺子里休息。到了三更天，再从村西头巡逻，就这样往返四次，五更的巡逻任务就完成了。更夫整晚不能回家，要在铺子里待到天明才可回家。

母亲问昌叔：“您这个活儿挺轻松嘛，两个人做伴，两个小时在街上走一趟，然后到铺子里休息，说会话也行，睡会儿觉也行，不怎么累嘛！”昌叔说：“听起来挺轻松的，但是做起来蛮辛苦的。一是怕遇到坏天气，下雨刮风你都得出去，特别是冬天，大风大雪你也得走出去。二是夏天在铺子里闷热，蚊虫叮咬；冬天虽然避风，但是还是怪冷的。”

我挺好奇地问昌叔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打更？”昌叔说：“为了村里的治安，防止土匪、盗贼等坏人搞破坏。”我听了后，觉得打更还是挺危险的，又问：“你们逢到过坏人吗？逢到了怎么办？”昌叔说：“坏人也不傻，听到梆子声，他才不出来呢！再说，我们也没拿什么武器，连根棍子也没拿，真有坏蛋的话，我们也不敢捉啊，只能敲敲锣把他吓跑罢了。”母亲又问昌叔：“照你这么说，打更岂不是没什么用吗？”昌叔说：“不能说没有用，还是有点用的。一是可以向村民报告个时间点，知道到了什么时间该干什么活儿啦；二是有吓唬坏人的作用，做贼者心虚嘛；三是还有提醒大家防止其他安全事故的作用，譬如防火灾。”

说到防火灾之事，昌叔说了一段真实的故事。有一年春天的一个夜晚，张某和王某俩人打更。他们走到王某胡同口时，闻到一股烟火味，看见王某人家的西厢房冒着黑烟，并有火光隐现。二人知道这是着火了，王某马上去敲门告知主人；张某则马上敲锣报警，引来许多街坊邻居前来救火。众人泼水灭火。房主人说：“幸亏打更的兄弟们报信，救得及时，否则火势蔓延到正屋，损失就大了，十分感谢打更的兄弟们啊！”村民也都说：“打更人立了功，打更这个办法好。”

再说说打更铺子。东头那个打更铺子什么样，我不知道。西头这个就在我家房子东屋外山墙旁边，那里是孙根新家的没有围墙的场院，北靠大街，西靠我家的房子，是一个大半部在地下、小半部在地上的窝铺，东西长约5米，南北宽约4米，深约2米，地上围墙高约0.5米，顶面搭有五根木梁，上面铺满厚约0.3米的高粱秸，表面又抹上一层约0.1米的草泥巴，南高北低一面坡，便于雨水雪水流泄。铺门开在南面偏右一点，门口是三个台阶的斜坡，进入时须低着头。铺底也铺满厚厚的高粱秸，上面又加了一些麦秸草。因为向阳避风，铺里暖烘烘的，只是没有窗户，光线略暗些。

晚上，打更人在里面休息，一二更时，也会有街坊在里面聊天。夜深了，就只有打更人了。白天，这里会有许多人在里面聊天，有的下象棋，有的下五车(jū)。因为它离我家近，也是我常去的地方。我和伙伴们常在里面讲故事、猜谜语、下五车，玩得可开心啦！

时光飞逝，打更的那个年代已经过去，我对打更的那些事，早已淡忘了，但是那个打更铺子至今仍清晰地记在我的脑海中。